



中国人口发展、农民工流动 趋势与刘易斯转折点

陈金永*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主要探讨人口与经济的交互影响，尤其关注国内劳动力迁移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了给该论文集后面章节提供基本的背景，本文对迁移人口和流动劳动力的统计及其近期趋势进行了简要的综合分析，这部分也可作为研究中国内部迁移的统计指南。本文第二、第三部分阐释了数据问题，并且利用数据分析迁移总趋势；第四部分介绍了论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最后，作者将对论文集涉及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进行讨论。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迁移；人口

* 陈金永 (Kam Wing Chan)，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

本文原为英文稿，发表于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Kam Wing Cha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in Cai Fang and Du Yang (eds.),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ume 1: The Approaching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rill Publishers) 上。本文由程杰协助翻译，特此衷心致谢。中文译稿经过作者最后审阅。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的“导读”部分，所以文中既有作者观点的表达，也有对该论文集相关内容的介绍。——编者按

一 引言

农村向工业部门提供的丰富廉价劳动力是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初， “中国制造” 风靡全球， 这与农民工以仅能维持生计的低工资创造的出口是密不可分的 (Scott, 2006)。 农民工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支柱 (Liang, 1999; Chan, 2007)。 在出口导向型城市， 如深圳和东莞， 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些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 (约占 70% ~ 80%)。 即使像武汉这样更典型的内陆城市， 2000 年外来工 (指没有本地户口的) 也占到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43%^①。 2007 年， 估计农民工对北京和上海的 GDP 贡献率分别达到 30% 和 31%^②。

尽管人口迁移与流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没有人能搞清楚迁移 (含流动) 人口的总规模， 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方面的主要统计数据有着不同的统计口径 (Liang and Ma, 2004; Thomas, 2001)。 无可否认， 迁移本身的确是较难准确测量的 (因为它比生死更具 “动态”)， 而且迁移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界定有别于其他国家所惯用的定义^③。 正如本文后面所要探讨的， 由于特殊的制度安排、 人口与迁移管理体系以及统计体系等因素， 中国的迁移统计变得异常复杂。 在人口的流动迁移过程中， 户籍制度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由此导致相关的统计相当复杂混乱。 在许多官方发表的报表统计资料中， 非户籍的人口往往不包括在内^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将中国的流动人口称为 “统

① 基于 2000 年武汉市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

② “农民工失业调查”， 2009 年 1 月 9 日《财经》第 229 期， <http://www.caijing.com.cn>。

③ 这并非迁移数据独有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就业和城镇统计中， 参见 Cai (2004)。

④ 例如， 虽然上海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但是在 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中， 关于人口和劳动力的部分有 29 个表， 仅有一表一小栏数据列出 “外来人口” 的数据 (表 3.3)。

计上看不见的人口”^①。这些问题往往影响到我们分析人口迁移、工业化、城镇化诸多相关的议题，例如争论激烈的“刘易斯转折点”（Green, 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主要探讨人口与经济的交互影响，尤其关注国内劳动力迁移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了给该论文集后面章节提供基本的背景，本文对迁移人口和流动劳动力的统计及其近期趋势进行了简要的综合分析，这部分也可作为研究中国内部迁移的统计指南。本文第二、第三部分阐释了数据问题，并且利用数据分析迁移总趋势；第四部分介绍了论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最后，作者将对论文集涉及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进行讨论。

二 迁移和农民工流动的界定

有关中国内部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一定要从户籍制度及其与迁移的关系出发。众所周知，“正式”的迁移在中国是被严格限制的，试图永久地或正式地改变居住地的人必须从当地政府获得转移户口的批准（Chan and Zhang, 1999）。对于城镇居民，一般情况下允许在同一城市内部改变户籍地（如在一个城镇内将户口从一个街道转移到另一个街道）。同样地，由于婚姻或其他合理的原因，农村居民在农村内部迁移通常也是被允许的。但是，涉及城乡之间户口变化的正式的（或者“永久的”）转移则被严格限制，除非得到公安机关的正式批准。这种批准不易取得，仅仅在迁移符合中央或地方政策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时才能实现^②。一般来说，普通人要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镇或从小城市迁到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http://www.undp.org.cn/downloads/nhdr/nhdr1999.pdf>. Roberts (2002) 持相同的看法。

② 过去国家招募劳动和征用耕地是户口迁移的主要途径，而最近，户口（购房落户）也成为地方政府“刺激”低迷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工具。

大城市是非常困难的 (Wang, 2005)。改革开放以前, 户籍制度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国内护照”制度, 旨在阻止农村人口外流, 同时, 它也是一个“福利分配”机制, 以保障国家提供的福利仅限于服务城镇居民。目前, 这一制度基本上是利益 (尤其是福利) 分配的机制, 而不再被用来阻止人口的流动。也就是说, 农民允许进入城市工作, 但他们仍然不能获得当地的户口, 因此他们不能享受许多普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本地社会福利。

因此, 我们可以将迁移划分为两类: 拥有本地居住权 (本地户口) 的移民 (后面称为“户籍移民”), 这类迁移的开放对象非常有限 (近年来主要是富人或高学历群体) (Chan and Buckingham, 2008); 没有户口居住权的移民 (“非户籍移民”)。

在中国, 只有户籍移民才能被正式称为“迁移”, 而其他方式的迁移均被视为“人口流动”, 这意味着一个“暂时的”、不能永久居住 (在法律上无权) 的流动。尽管实际上许多非户籍移民可能在某一地居住多年, 但在官方统计中仅仅将其视为“暂时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 户籍移民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永久居民, 并且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合法地位, 能够获得本地居民拥有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和权利。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户籍和非户籍区别尤其重要, 因为这涉及不同的财政支出和行政职责。直到最近两三年, 中国各省市每年迁移的官方报表统计都是基于户籍人口的, 发表的仅仅是地方户籍人口的数据, 迁移人口的数据也只是户籍迁移的数据。直到近几年, 有些地方才公布了“暂住人口”的非户籍人口统计数据。除了户籍迁移, 在过去 20 多年来, 研究人员和统计机构也通过各种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来收集实际的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的统计数据。由于中国大部分的人口流动具有循环性和临时性的特征, 要准确测算与界定流动人口并不容易, 技术性的问题较多。

表 1 显示了基于不同数据来源整理得到的中国内部迁移统计的总体情况。这些数据有些从迁入地收集得到, 有些从迁出地 (主要是村庄)

收集得到。尽管这些数据口径不一样，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当把它们放在一起分析时，它们并不矛盾且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大体上合理，这将在下面进行解释。

表 1 中国总体迁移主要的统计 (1982 ~ 2007 年)

单位：百万人

	户籍移民 (年度流量)	非户籍移民或流动人口(存量)					
		一般 估计	暂住人口			农民工	
			公安部 登记	全国人口普查/国 家统计局人口调查		卢迈等 (2002)数据	根据农业部 调查估计
地理范围	城市、镇或乡		乡镇或街道	县或市	一般指乡	乡	
最低逗留 时 间	没有 限制	通常 数夜	3 天	6 个月	6 个月 或 1 年	经常在乡镇以外就业	
指标	A	B	C	D	E	F	G
1982 年	17.3	20			6.6(1 年)		
1984 年	19.69	20					
1987 年	19.73				15.2 (6 个月)*		
1988 年	19.92	70				26	
1989 年	16.87					30	
1990 年	19.24				21.6(1 年)		
1991 年							
1992 年	18.7	60 ~ 70					52.8
1993 年	18.19	70				62	
1994 年	19.49					70	
1995 年	18.46	80		49.7	29.1 (6 个月)**	75	69
1996 年	17.51			60			
1997 年	17.85	100	37.3	61.8			
1998 年	17.13		40.5	62.4			79.8
1999 年	16.87	100	40.4	63.7			
2000 年	19.08		44.8	144.4			

续表 1

	户籍移民 (年度流量)		非户籍移民或流动人口(存量)				
			一般 估计	暂住人口		农民工	
				公安部 登记	全国人口普查/国 家统计局人口调查	卢迈等 (2002)数据	根据农业部 调查估计
地理范围	城市、镇或乡		乡镇或街道	县或市	一般指乡	乡	
最低逗留 时 间	没有 限制	通常 数夜	3 天	6 个月	6 个月 或 1 年	经常在乡镇以外就业	
指标	A	B	C	D	E	F	G
2001 年	17.01		55.1	N/A			
2002 年	17.22		59.8	109.3			
2003 年	17.26	140	69.9	107.8			98.2
2004 年	19.49		78	106.6			102.6
2005 年	19.33		86.7	147.4			108.2
2006 年	20.6	150	95.3	128.7			114.9
2007 年	20.84		104.4	120.7			

注：* 地理范围包括城市、县和镇；** 地理范围以县为单位。

资料来源：

A：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群众出版社，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B：1984、1995 和 2006 年数据引自于学军（2008），其他数据通过各种资料汇编整理。

C：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群众出版社，相应年份。

D 和 E：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国家统计局，《中国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务院、国家统计局，《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F：卢迈、赵树凯、白南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载于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第 555 ~ 587 页。

G：“农业部：今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达 1.1149 亿”，2006 年 11 月 27 日，<http://sh.shuangliao.gov.cn/nyzx/xwzx/nydt/nydt/200611/4168.html>；农业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主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第 86 ~ 98 页。

户籍移民指标 (A): 这一指标涉及户籍移民, 并且是表 1 中唯一的“流量”(flow) 数据指标。数据反映了每年正式获得目的地(城市、镇和乡) 户口地位的迁入移民数量, 这些户籍移民数据是公安部每年统计公布的。它代表了特定时期所有正式批准迁移户籍(居民) 的总数, 包括从乡镇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从乡镇到乡镇等, 但不包括城市和乡镇内部之间的流动。

非户籍人口指标 (B - G): 这些指标涉及一般称为“流动人口”的群体, 被定义为在户口登记地之外的某一行政区域(通常是城市、镇、街道或乡) 居住的群体。“流动人口”不是“法理人口”(de jure population), 从而导致与“实际人口”(de facto population) 数量存在巨大差异, 最极端的例子是深圳。与指标 A 的户籍移民“流量”(flow) 不同, 表 1 中显示的非户籍人口指标是移民的“存量”(stock), 即某一特定时间点上某地居住的非户籍移民数量。基于不同的目的, 地理范围和最低逗留时间标准的界定也存在差异, 从而可以想象到, 在相同年份中不同指标测算的流动人口数据也可能不相同。

指标 B: 这一指标定义的流动人口涉及范围最广, 包括了全部没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而不考虑其居住时间的长短, 可以是仅仅逗留一晚, 也可以是居住了几年。由此, 这一指标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人群, 包括旅客、出差人员、商人、短期逗留人员、农民工等, 而且包括就业和非就业人员。我们从媒体得到的此类人群的数据相互之间的差异经常很大, 反映出这一指标不够系统、问题较多。部分全国的总数据是通过简单估算得到的, 另有一些是通过抽样调查、铁路运输量以及(或者) 其他更可靠的指标(如 C、D、E) 推测得出。表 1 显示了在特定时间点上中国媒体上公布的若干典型数据。鉴于指标的性质, 这些数据仅可以作为粗略趋势的参考。

指标 C: 与指标 B 不同, 这是一个系统的“流动人口”指标, 它是基于一个更狭义的流动人口概念界定。1997 年以来的数据都能够从公安部获得。根据规定, 任何人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居住 3 天及以

上均要求在当地派出所作暂住登记。因此，这一类人群也被当地公安部门划分为“暂住人口”。当然，很大一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这也是指标 B 和指标 C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指标 D 和 E：这两个指标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一个统计系列，只是口径略有不同。人口指标的界定首先是有没有本地户籍，其次考虑居住时间。D 和 E 规定了一个比 B 和 C 更长的最低居住时间（6 个月或 1 年）的口径。因此，即使地理范围的界定相同，指标 D 和 E 也将比指标 B 和 C 反映的人口数量少。国家统计局也将这部分人群称为“流动人口”，有些研究人员也称其为“temporary population”（暂住人口）（Yang, 1996）。其实，大部分真正“暂住”的人群（居住时间短于 6 个月的，如旅客、短期农民工）并不包括在这指标内。近两三年来，国家统计局开始在各类的统计年鉴上，正确地将这部分人群（居住时间超过 6 个月的）视为统计上的当地的“常住人口”，这样的做法，跟国际接轨，更能反映实际情况。表 1 内指标 D 和 E 的数据来自于全国人口普查（1982、1990 和 2000 年），1987、1995 和 2005 年的“小普查”（1%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以及 1996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实施的年度抽样调查。即便在相同年份（如 1995 年），指标 D 的统计数值也比指标 E 大，因为指标 D 的人口迁移被界定在更小范围的地理或行政单位。

指标 F 和 G：这两个指标涉及特定移民群体，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这也是“流动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农民工是指从农村地区流出的劳动人口，他们在迁入地生活但没有本地户口^①，相关数据通过农村抽样调查收集得到。农民工大多数是非技术或者低技术工人，而且有些农民工的流动具有季节性特征，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 2~3 次。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农民工规模开始增长，几个全国范围的农民

^① 这里不是“农民工”的广义界定，广义的还包括在本乡镇内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企业工作的人员。

工调查也随之实施。但是，大部分调查多是一次性的，数据相互不完全可比（因为口径不同）。表 1 中显示的这两个指标，采自部分学者引用的来自于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年度全国抽样调查。全国农民工的总体数量通常是根据抽样调查的农民工比例估计得到。农业部固定观察的样本分布在全国 300 个村 7000 个农户，它所用的定义与一般通用的农民工概念非常接近。根据这个定义（指标 G），在 21 世纪初期，全国大约有 1 亿 ~ 1.15 亿流出的农民工。该指标覆盖了较长的时期（1992 ~ 2006 年），而且相对其他数据具有更强的内部一致性。最新的农民工（大概基于近似的定义）数据来自于中国第二次农业普查，2006 年规模达到 1.32 亿人（于学军，2008）。

三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的迁移趋势

根据表 1 显示的数据，可以确定几点总体的迁移趋势：在过去的 25 年，尽管全国迁移（含流动）总体数据处于增长态势，但是由公安部记录的户籍移民的年际变化并不大，基本稳定在 1700 万 ~ 2100 万人之间。实际上，相对于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户籍移民比例已经稍有下降。根据公安部发布的详细户口数据，1993 年以来，80% ~ 90% 的户籍迁移发生在城镇地区。户籍移民数量每年相对稳定以及城镇地区的高比例，反映出政府对跨城市和跨乡镇户口迁移的强烈干预，而这一干预机制通常以户口配额（总量控制）来实现。

另一方面，表 1 显示出，非户籍移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基本上一直在增长。以指标 B 为例，流动人口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增长，到 1988 年已经达到约 7000 万人，之后由于经济紧缩计划使其在 1989 ~ 1991 年间下降，但是，从 1992 ~ 1997 年再次迅猛增长，1997 年已经达到 1 亿人，而 2006 年普遍估计已经达到 2 亿人。同样地，在 1992 ~ 2006 年间，农民工（指标 G）数量增长了一倍多，从 5300 万人增长到 1.15 亿人。图 1 显示了四个非户籍人口统计结果，总体上升

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农民工指标（F 和 G）的对接较好地展现了 1988 ~ 2006 年的连续上升趋势。总体上，表 1 所显示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数据和趋势，与其他相关研究大体一致（杨云彦，2004；赵树凯，1998；Scott et al.，1999）。2005 年 1%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发布的流动人口数据为 1.474 亿人（指标 D），而向公安部门登记的流动人口（指标 C）只有 8670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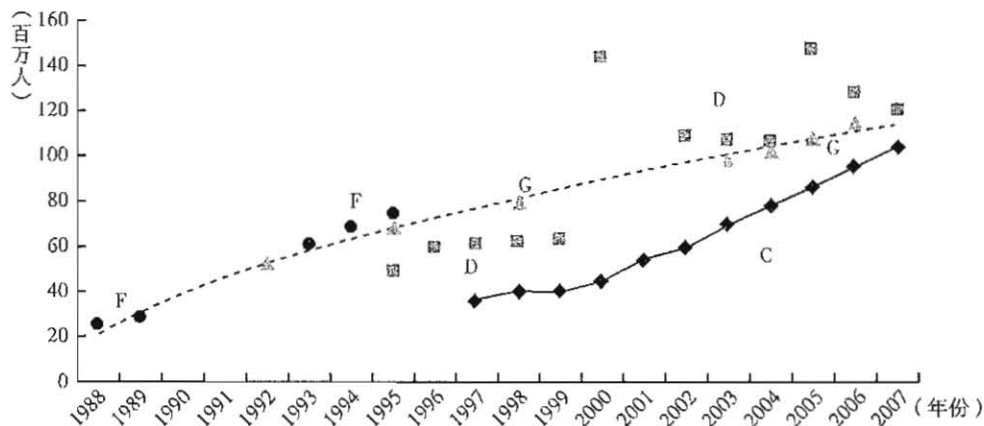


图 1 1988 ~ 2007 年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

说明：“C”、“D”、“F”和“G”涉及表 1 中的指标序列，“C”和“D”指“暂住人口”，“F”和“G”指“农民工”。

资料来源：同表 1。

相对其他指标的数据，指标 D 的变动趋势显然不是那么平滑，存在明显的摆动：2000 年和 2005 年两个数据点似乎明显脱离（高于）趋势线^①。另外，通过对数据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

① 2000 年和 2005 年数据的准确度应比其他年份数据更高，因为它们或者来自全国人口普查（2000 年）或“小普查”（2005 年），而其他数据则来自年度 1% 抽样调查。然而，作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包括 2005 年“小普查”）可能高估了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年度 1% 抽样调查则产生了相反的误差，可能低估了流动人口的规模（Chan, 2003）。考虑到上面的可能性，实际的流动人口规模（指标 D）应该介于这两组数据之间，如此推测，2005 年和 2006 年指标 D 的实际数值应该在 1.3 亿 ~ 1.5 亿人之间。

期的移民数量增长趋缓，可以通过指标 C 和指标 D 反映出来。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因素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减少：（1）这一时期城镇经济发展放缓；（2）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就业竞争；（3）地方政府排斥外来人口就业的保护性政策增多；（4）农村经济改善，至少 1996 ~ 1999 年间有此表现（Cai and Chan, 2000）。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移民数量增长趋缓，这也与 Chan 和 Hu（2003）、蔡昉（2002）关于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总体趋势判断是一致的，因为农村向城市迁移占了 90 年代农民工的很大比例。早在 21 世纪初期，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恢复到较高水平。根据表 1 可以看出，2003 ~ 2006 年农民工的年均增长达到 560 万人，而 1992 ~ 2006 年的年均增长只有 440 万人。2004 年，经济增长更快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①。如前提及，2006 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 1.2 亿 ~ 1.3 亿人。但是，2008 年夏季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这些产业正是农民工的集中地，我将在最后部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本论文集后面的文章集中关注最近 10 年的情况，本文上面的内容主要为后面的文章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统计上的关键问题。

四 论文集收录的文章

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 1 卷）收录了 14 篇文章，基本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过去两年编著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该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本论文集的主编。本论文集展现了该研究所的学

^① 2003 ~ 2006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增长率约为 5.4%，而珠三角地区的东莞，2000 ~ 2004 年农民工年均增长率高达 18%。数据来源于东莞统计局，参见 <http://tj.dg.gov.cn/website/web/zhtjnj/2005TJNJ/02/sheet004.htm>。

者，以及中国其他著名研究和政策单位的同行们在人口和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收录的文章是基于详细的数据分析所做出的研究，这些数据来自于近些年全国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口和就业问题是论文集的关注点，重点在于中国人口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政策涵义。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很快，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许多西方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历程。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略超过一代人时间内的变化，观察到一个经济和人口转型的相对完整过程。本论文集的章节安排遵循了这一发展过程的逻辑顺序，为大家阐述这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政策意义的经济与人口转型的故事。

第一章作为背景阐述了中国人口动态变化的全貌^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型及其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和人口老年化问题。接下来的两章考察了人口变化、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第四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抚养比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口抚养比率下降与劳动供给增长和储蓄率提高的关系，提出了推动这20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人口红利”的这一观点。第五章探讨了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发展如何有助于解决东亚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城市职工下岗问题。

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蔡昉和王美艳通过对一般经济增长模式的考察得出结论：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初始阶段。这个“转折点”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命名，其二元框架下（农村与城镇）“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理论是众所周知的（Lewis, 1954），这个二元（两部门）模型可用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研究（Chan, 1994；蔡昉，2007）。刘易斯认为，工业化使来自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递减并逐渐消失，在这一关键时点到来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将开始迅速提高。经济发展

^① 关于中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不同表述，可以参考 Chan 等（2008）。

将面临由劳动力剩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型，从而导致非技术转移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压力（中国学者的研究认为 2004 ~ 2007 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都阳及其合作者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第十一章重点考察了劳动保护和立法的影响。

第八、九和十二章对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角”——农民工——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并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在第八章中，韩俊等详细地描述了劳动力短缺与农业内部劳动力过剩并存的现象，我将在后面部分对此进行讨论。在第九章中，王美艳利用 2001 年和 2005 年两次大规模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一问题在 2003 年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最近相关报道明显减少，表明政府的强有力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在控制其他变量因素后，王美艳用收入差异衡量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歧视状况，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最近年份各种户籍改革已经启动，但是农民工歧视程度仍然较大，而且没有明显减弱趋势。这一研究与 Chan 和 Buckingham 最近得出的观察判断是一致的。在第十二章，王美艳利用同一套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和城镇工人的教育回报率，得到了非常有用、具有政策价值的结论。

围绕劳动力短缺问题，最后两章（第十三、十四章）立足于贸易扩展和全球化的背景，更全面地探讨了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及其需要探索的新路径。研究认为，中国亟须构建一个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包括更深入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农民工的更多保护。作者同时建议，中国工业化战略应该由基于廉价劳动力向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

五 相关讨论

本论文集的主题是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

供给的减少，尤其重要的是农村向城镇供给的劳动力短缺。最后一点意味着，经过多年的低增长，中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初始阶段：经济发展中不再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蔡'U对这个重要而新的命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与贡献（蔡'U，2007）。在2004~2005年，广东和其他沿海省份出现了“民工荒”，企业迫于劳动力供给压力而提高工人工资，这一情况被广泛报道，本论文集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Goodman，2004）。“民工荒”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工资与福利），是逐渐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一步。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对于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低效率、不公平的“二元经济”和城乡部门分割的“二元社会”开始走向终结。这两个二元结构已经困扰中国长达半个世纪，并且已经成为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直至一元社会之路的主要障碍（Chan，2009）。因此，按照Ranis（2004）的观点，这个转折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更加均衡的部门经济增长即将到来。中国由于其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成为“世界工厂”（Anita，2003），这一转折点的到来必将带来重大的全球性影响：可能引发基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比较优势的世界不同层级经济体之间的重大调整（Barboza，2006）。

刘易斯转折点假设的支持者相信，在25年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廉价劳动力即将消耗殆尽，转移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逐渐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有必要从粗放的“消耗”模式向一个更集约和可持续模式转变。这一主题备受关注而且存在激烈争论（樊纲，2005；许经勇，2005；吴学安，2004）。当然，在此我不对这个复杂的问题进行系统讨论，只是基于近期对户口改革的相关研究，并且考虑到在最近由“美国制造”的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显然，这个经济危机是其他论文的作者不能预见的），提出自己的看法。以2009年初为结点，我将阐述三个问题，跳出传统的古典经济和人口理论的框架，对这个“刘易斯过程”做出较全面的

分析^①。我对劳动力短缺的出现没有异议，中国近期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注定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样重要的是要探究其背后凸显的问题，这更能触及本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1) 根据最近的调查，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国政府估计大约有 2000 万农民工（约占总体的 15.3%）失去了工作（Keith, 2009）^②。由于过去一年，尤其在最近几个月，世界对中国出口需求急剧下降，似乎始于 2004 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目前已经荡然无存。显然，目前政府的重大问题是创造和保障就业^③。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出口快速持续增长，从而导致了部分地区（如东莞）经济的急速膨胀，并且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瓶颈，而当前的农民工失业问题可以说是与 2004 年的情况大相径庭，2004 年的劳动力“短缺”主要定义在典型出口行业需求的狭义劳动力需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下面将讨论）。

东莞的劳动力短缺最为严重，1990 ~ 2005 年该市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 20%，对外来劳动力需求基本上每 5 年就翻一番，1995 ~ 2004 年间农民工就业规模惊人地增长了约 3 倍，从 130 万人增长到 470 万人^④。可以想象到，这必然导致一个极度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但是，这种现象也可能是短暂的。随着中国部分产品质量问题（例如玩具和罐头食品）的广为传播，加上 2007 年与 2008 年初全球原料和燃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中国产品涨价），世界对中国制造产

① 这三点问题在论文集的相关章节也被提及或者暗含。

② “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中国网，2009 年 2 月 27 日，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3139/44_1_0101_desc.htm；“2009 年 2 月城镇人口（本地户口）登记失业率 4.2%”，参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出现大幅下滑”，2009 年 3 月 10 日，http://lianghui.china.com.cn/2009lianghui/2009-03/10/content_17413922.htm。

③ “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中国网，2009 年 2 月 27 日，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3139/44_1_0101_desc.htm。

④ 数据来源于东莞统计局，<http://tjj.dg.gov.cn/website/web/zhetjnj/2005TJNJ/02/sheet004.htm>，<http://tjj.dg.gov.cn/website/web/zhetjnj/2006ZY/sheet066.htm>。

品的需求开始衰退，2008年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重创了中国出口部门。由此，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了转向“过剩”的急速反转。初步的数据显示，即使在2004~2005年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地区珠三角，2009年2月约1003万农民工抵达这一地区，但是大约20%的人没有找到工作^①，而农民工工资也已经下降了10%^②。

在三四年间，农民工的就业形势这么容易出现大逆转，归根结底，是源于中国目前增长模式的弱点。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如纺织和玩具等出口产业，本质上有巨大不稳定性，这是非中国内部可以控制的，而劳动力需求也将不时地产生明显的波动。

(2)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历史的产品：在有限耕地资源条件下积累近几个世纪的超大规模人口，导致了人地关系非常紧张，劳动力市场很难消化庞大的非技术农业劳动力（Chao, 1986），这正是刘易斯的理论所预测的。然而，在充裕的农村劳动力之外，还存在一个现代的制度附加因素，这加剧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劳动力剩余状况。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是50年前实施的户口制度，它是计划经济和实施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典型的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国发展战略以牺牲农业和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为重要的前提（Chan, 1992, 1996）。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被限制在乡村内，随着人口自然增长，人地压力在1950~1980年迅速加大，这一制度安排使农民（包括他们的劳动和土地）的机会成本非常低（Kelly, 2008）。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更突出地表现为歧视和排斥农民

① “招工企业数同比降10%~30%，薪资同比下降一成”，2009年2月9日《财经》，<http://www.caijing.com.cn/2009-02-09/110054227.html>。“春节后2000万农民工盲目流向广东”，2009年2月4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04/content_696961.htm。

② “招工企业数同比降10%~30%，薪资同比下降一成”，2009年2月9日《财经》，<http://www.caijing.com.cn/2009-02-09/110054227.html>。“春节后2000万农民工盲目流向广东”，2009年2月4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9-02/04/content_696961.htm。

工享用社会福利，而不再是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Wang, 2005）的工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被解放出来，从而有助于缓解人地压力，但是，转移到城市或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力并不拥有本地户口（即居住地的公民身份）。这阻碍了农民工融入社会或当地城镇人口，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超低成本庞大弱势阶层，从而为面向全球需求的中国新经济提供了高度灵活、可流动（且可随时利用、解雇的）的产业工人（Solinger, 2006；Lee, 1998；Alexander and Chan, 2004）。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超低，“中国价格”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户籍制度有助于维持一个超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从而有效地延长了低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一制度延迟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①，以至于诸如深圳、东莞等城市和出口加工区能够长期以极低的工资（大致在可维持农村生活的工资水平）获取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创造高速的经济发展。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曾表示，1980年以来大约20年间，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实际增长^②。一个看似明显但让人惊讶的事实是，尽管最近3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基本上没有增长^③。

换句话说，除了积累几个世纪的人口压力因素之外，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也压低了农民工的可得工资，并且使农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弱势阶层（Kelly, 2008）。种种迹象表明（Chan and Buckingham, 2008；蔡昉, 2007），只要这一制度仍然存在，

① Wang (2005) 认为，户口制度使中国避开刘易斯转折点。

② “工资20年几乎不变，李德水解读民工荒经济原因”，2005年1月27日《北京晨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3149315.html>。考虑到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生产力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纪初农民工工资的停滞更为严重。

③ 根据蔡昉测算，即使在2004年，农民工工资也仅仅是其劳动边际生产率的1/4，这意味着劳动力价格提高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推动的，但前者并没有赶上后者（2008年9月5日《财经》杂志对蔡昉的采访）。感谢 Dorothy Solinger 提供这一信息。

并且对低技术的农民工继续歧视，低成本农村劳动力供给仍将保持较大规模的水平（而有趣的是，户籍制度同时也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部门供给）。

（3）除了超低工资外，出口部门对雇用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很苛刻，在出口工业，农民工以 16 ~ 34 岁的年轻群体（通常也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为主力军。这主要反映了雇方的需求：雇用者认为年轻农村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高质量”的。这些所谓的“高质量”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年轻女性的身体素质，例如更灵活应对复杂、快速而且节奏重复的生产线工作（尤其在电子行业），到工作“态度”，例如可忍耐更长工作时间（每月工作 28 ~ 29 天）（Green, 2008）。这些“素质”都要年轻和未婚的劳动力才具备，当然，他们也更能够接受集体宿舍甚至营房的生活。

这种对雇工素质的“偏好”，实际上是对劳动力“消耗性”的使用，很不利于农民工逐步提高工艺水平，更不可避免地将可利用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同时，由于户籍制度，农民工仅仅被看做是“暂住”群体，他们缺乏在工作所在地（城市）的正式居民的地位，由此，他们无法融入城镇社会安全网，也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可获得的服务和福利。对于大部分已经结婚生子的年长农民工来说，在这一制度环境下他们在城市维持生活极其困难。由于缺乏所谓的“素质”以及难以融入城镇社会安全网，再加上城镇生活成本的逐渐提高^①，更多的农民工会在年老时选择返回农村^②。加上近年政府实施的有关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工供给，2004 ~ 2006 年劳动力短缺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③。

① 面对城镇房价和租金的快速上涨，过去 10 年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扩展了经济适用公共住房，但是农民工并不能够享受此福利。

② “民工不能进城定居导致民工荒持续”，2005 年 4 月 15 日《中国经济时报》，<http://news.beelink.com.cn/20050415/1827521.shtml>。

③ 例如，2006 年取消农业税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参见 Green, 2008）。

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并不是农村部门所有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而是特定年龄劳动力群体的短缺而已。根据韩俊等撰写的第八章中相关调查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较大规模的劳动力过剩，主要是35岁及以上的农民，估计规模约为1亿人^①，这远未达到全国充分就业。而在刘易斯模型中，当“转折点”到达时假定实现全国充分就业。因此，中国工业化之路中劳动力短缺和农村部门大量过剩并存的现象的确是十分独特的，而这主要源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工的超低工资归因于人口众多和制度的双重负担。仅仅一个特定年龄阶段劳动力短缺，即使是永久的缺乏，对于打破中国二元结构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只有基于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未来几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以至少每年700万~800万的规模增长，远高于过去15年农民工的年均净增长人数（按照先前计算的约为每年440万人）。如果我们用广义的也是更重要的劳动力“短缺”的定义，似乎中国仍有一定的剩余劳动力供给空间。但是，如果我们将农民工的范围限定在16~34岁，未来几年的供给水平将仅仅为每年300万~400万人^②，按照过去15年的需求水平将存在每年约100万人的缺口。随着最近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逐渐消退，一旦中国出口增长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这些年轻劳动力供给将在几年后出现短缺。

从政策角度来看，应该为年龄较老的农村劳动力扩展产业和其他城镇就业岗位，这将带来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利益，而不只是狭隘的企业家短期利益。老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将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老龄人口退休的

① 这一估计数据与作者对2006年农村地区劳动力剩余粗略估计相近：农村总劳动力为4.7亿人，已经转移劳动力2.26亿人，农业劳动力需求为1.5亿人，则剩余劳动力为9400万人。当然，这一剩余估计取决于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假定。根据第七章的表7.2，蔡昉和王美艳使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数据更高（1.78亿~2.28亿人），也可以参见Green（2008）。

② 作者根据2005年1%人口调查的年龄数据估计。

财政负担，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未富先老”的严重问题。香港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转型经验，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经验表明，制造业和低端服务性工作能够较多地吸纳 35 岁及以上的低技术劳动力。中国的低端服务行业，例如保洁和家政工作，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显然，2004 ~ 2006 年劳动力“短缺”是农村年轻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的标志。现在看来，这些年农民工工资上涨仅是昙花一现，而在始料未及的全球经济衰退冲击下，基本上消失殆尽。而且，工资上涨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特定年龄组劳动力。总体来看，整个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民工）的经济和政治的讨价还价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在政策方面，我同意蔡昉^①和本论文集的诸位研究者的观点，支持更大程度地削减城乡壁垒以便于创造一个功能健全的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尤其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允许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并且为他们及其家庭构建社会安全网，例如“便携式”（多地区通用）的养老金制度，这也将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引导劳动力向城市供给。农民工的权益需要得到保护，包括他们原来的土地，如被征用，应得到合理的补偿。对此，近几年中央已经出台了若干重要措施（Chan and Buckingham, 2008）。当然，短期任务是要为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对失业者提供救助。由于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了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当前这些工作对于防止这些人口快速贫困化尤为紧迫和重要^①。

概而言之，研究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历程和 1949 年后的工业化之路是复杂但又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各种因素错综交织，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既有一般的共性（如刘易斯所提出的），也有更多的中国特点（如前面所述的）。这要求研究人员积极从事细致的数据分析工作，从而找到适合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我希望这个导读能使读者更全面、更好地理解“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出现的独

^① 目前，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 40%。

特的经济、制度背景。至此，我诚请大家细读本论文集内丰富而又深入的分析内容，使我们可以更充分地诠释这史诗般的中国城乡转变历程。

参考文献

- [1] 蔡昉：《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 [2]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改革和发展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 [3] 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4]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5] 樊纲：《民工荒是一个短期暂时性问题》，2005年9月10日，<http://news.bceiink.com.cn/20050910/1928546.shtml>。
- [6] 吴学安：《轻言“民工荒”为时过早》，2004年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929562.html>。
- [7] 许经勇：《本是同根生：透视“民工潮”与“民工荒”》，《调研世界》2005年第8期。
- [8] 杨云彦：《中国90年代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南方人口》2004年第75期。
- [9] 于学军：《推动人口流动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 促进城乡科学发展》，北京：改革和人口发展论坛，2008年10月23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2008-10/23/content_16647215.htm。
- [10] 赵树凯：《农村劳动力流动：新阶段和新问题》，载于《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1] Alwyn Scott, 2006, "Bridging Two Worlds: A New Life for Susie Cheng", *Seattle Times*, July 9.
- [12] Anita Chan, 2003, "A Race to the Bottom", *China Perspectives*, March-April,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document259.html>。
- [13] Bradsher, Keith, 2009, "China's Unemployment Swells as Exports Falte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 [14] Cai Fang and Kam Wing Chan,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Protectionist Employment Policie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 [15] Cai Fang, 2004, "The Consistency of China's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The*

- Chinese Economy*, 37 (5): 74 – 89.
- [16] Ching Kwan Lee,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7] C. Fred Bergsten, Charles Freeman,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J. Mitchell, 2008,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105 – 136.
- [18] David Barboza, 2006, “Labor Shortages in China May Lead to Trade Shifts”, *New York Times*, April 3.
- [19] David Kelly, 2008, “Reincorporating the Mingong: Dilemmas of Citizen Status”, in Ingrid Nielsen and Russell Smyth (eds.), *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 [20] Dorothy Solinger, 2006, “The Creation of a New Underclas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18 (1): 177 – 193.
- [21] Gustav Ranis, 2004, “Arthur Lewi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91 (August) .
- [22]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Zhou Li,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23] Kam Wing Chan and Li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60: 818 – 855.
- [24] Kam Wing Chan and Will Buckingham, 2008,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5, 582 – 606.
- [25] Kam Wing Chan and Ying Hu, 2003,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New Definition, Different Series, and Revised Trends”, *The China Review*, Vol. 3, No. 2, 49 – 71.
- [26] Kam Wing Chan, 1992,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 – 19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2): 275 – 305.
- [27] Kam Wing Chan, 1994,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8] Kam Wing Chan, 2003, “Chinese Census 2000: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hina Review*, Vol. 3, No. 2, 1 – 12.
- [29] Kam Wing Chan, 2007, “Misconception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ities: Definitions, Statistics, and Implication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8 (4), 397.

- [30] Kam Wing Chan, 2009, "Measuring the Urban Million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March, 22.
- [31] Kam Wing Chan, 2009,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 (2): 197 - 221.
- [32] Kam Wing Chan, Vernon Henderson, and Kai Yuen Tsui, 2008, "Spati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Origins,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ost-Reform Economic Boo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Kang Chao, 1986,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4] Kenneth D. Roberts, 2002, "Female Labor Migrants to Shanghai: Temporary 'Floaters' or Settl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6, No. 2, 492 - 519.
- [35] Liang Zai and Zhongdong Ma, 2004,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3, 467 - 488.
- [36] Liang Zai, 1999,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The Case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China",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28 (1): 115 - 137.
- [37] Peter Alexander and Anita Chan, 2004, "Does China Have an Apartheid Pass Syste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 (4): 609 - 629.
Peter Goodman, 2004, "Factory Labor Runs Short in China", printed in *Seattle Times*, September 26.
- [38] Scott Rozelle, Li Guo,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8, 367 - 393.
- [39] Stephen Green, 2008, "On the World's Factory Floor: How China's Workers are Changing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tandard Chartered Special Report*, January 14.
- [40] Thomas Scharping, 2001, "Hide-and-peek China's Elusive Population Dat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 (4): 323 - 332.
- [41] Wang Feiling, 2005,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2] W. A. Lewis,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139 - 191.
- [43] Yang Yunyan, 1996, "Temporary Residents in China: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1, 103 - 117.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Kam Wing Chan

Abstract: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 1)*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ocusing mainly on the interaction of demography and economy, and especially the role of internal migrant labor in that process. To provide a background for the remaining chapters, this introduction furnishes a brief account of migration and migrant labor statistics and their recent trends. This essay can also be used a statistical guide to China's major internal migration statistics.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 of this essay addresses the data issues and examines the trends and patterns.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ourteen articles in this volume. In the last section, I will discus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volume,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

Key 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Migrant Labor; Popu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01, J60